



延安文艺 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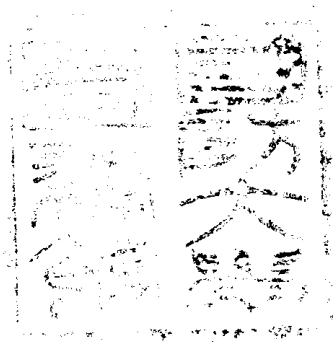
艾克恩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延安文艺回忆录

艾克恩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 白 焯 万小器

责任校对: 李宗贤

封面设计: 谭国民

版式设计: 张汉林

延安文艺回忆录

Yan'an Wenyi Huiyilu

艾克恩 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34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004-1100-6 / I · 114 定价: 7.80 元

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

江泽民
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

雁冰兄：

别去思又好几年了，最近身体不好，
不知好些否？回燕在长海，帮译的
间不多，未能多谈教益，特以为憾。
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王泽东 上 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一日

目 录

延安行 (节选)	茅 盾 (1)
战火中的大学	成仿吾 (26)
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	周 扬 (33)
毛主席的两次谒见	萧 三 (41)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丁 玲 (47)
我的文学生活	欧阳山 (67)
记延安文艺座谈会	何其芳 (72)
漫忆担任代主任后二三事	沙 汀 (78)
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	徐懋庸 (83)
延河水流不尽	刘白羽 (97)
枣园之宴	舒 群 (102)
难忘的延安岁月	萧 军 (113)
五月的延安	草 明 (117)
关于文艺工作团的回忆	荒 煤 (123)
延河边的黄昏	冯 牧 (127)
我在“鲁艺”的文学活动	贾 芝 (133)
鲁艺情深	穆 青 (137)
漫忆延安诗歌运动	艾 青 (142)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李 季 (145)
在诗的圣地	朱子奇 (152)

我是怎样写报告文学的	黄 钢	(157)
在中央党校排演《逼上梁山》	杨绍萱	(166)
回忆《讲话》前后“鲁艺”的戏剧活动	张 庚	(171)
人民喜爱的花神	阿 甲	(186)
难忘的延安艺术生活	舒 强	(193)
黄土高坡闹秧歌	李 波	(202)
春华秋实	彦 克	(211)
《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贺敬之	(221)
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	黄俊耀	(230)
延安西北文工团的闪光足迹 (节选)	苏一平	(238)
我是演歌剧起家的	陈 强	(250)
难忘的课程	于 蓝	(258)
延安影艺生活录	吴印咸	(265)
《延安与八路军》及其他	徐肖冰	(277)
影片《边区劳动英雄》拍摄前后	钟敬之	(280)
鲁艺的音乐轨迹	吕 骥	(288)
为人民做事	贺绿汀	(296)
《黄河大合唱》的写作故事	光未然	(299)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导下	李焕之	(303)
南泥湾的春天	马 可	(313)
我与郑律成写军歌	公 木	(318)
延安——歌咏城	时乐濛	(322)
鲁艺音乐系第二期散记	李 凌	(327)
我爱陕北秧歌舞	吴晓邦	(332)
谈延安木刻运动	江 丰	(338)

延安的木刻	力 群 (344)
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朝闻 (350)
我的一点回忆	彦 涵 (354)
窑洞风情	蔡若虹 (357)
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	华君武 (364)
到大“鲁艺”去学习	古 元 (371)
琐事纪实	刘 岷 (375)
改造“西洋景”	石 鲁 (382)
延安小鬼学画	李 琦 (38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

文艺运动	艾克思 (390)
编后语	(421)

延安行（节选）

茅盾

1940年5月24日上午8时，总司令的车队开出了西安城。车队有三辆卡车，共四五十人，除了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及其随行人员，其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其中我见到了龚澎。他们都穿了军装，充作朱老总的随从。亚男和阿桑也换上了军装，并且起了个假名。我和德沚、仲实仍旧穿便服，这是头天晚上决定的，因为我们算作知名人士，可以冠冕堂皇地去延安参观；如果换了装，改了名，被认了出来，反倒不好解释。况且我们穿上军装也不象个随从。朱老总乘第一辆车，他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在第三辆车上，驾驶室的座位则优待了德沚。我们五个人临时编成一个小队，派了一位从武汉来的大学生——名叫陈绪宗——担任我们的组长，这位组长的任务，就是一路上照料我们。他为我们坐在卡车的前部用铺盖垫了两个舒适的软座，还随身提着一个热水瓶。他告诉我们，到延安要走三天，第一天在国民党地区过夜，那里布满了国民党特务，行动稍一不慎，就有被绑架的危险。他特别警告阿桑，下车后不要乱走，不要看热闹。曾有去延安的青年，走到街上，一个特务故意撞他一下，反而诬告他打人，就被预先等在旁边的宪兵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交涉抗议都没有用，而汽车又不能因他一人滞留下来。他说，吃饭住宿一切由他来安排，我们有什么活动也要告诉他。他

又考问了阿桑是否记得那个假名字，叮嘱阿桑记牢，万一国民党的宪兵照花名册来点名，要准确回答。

傍晚，我们在铜川的一家旅店歇宿。朱老总住在附近另一片旅店里，晚饭后他特地过来看望我们。闲谈中，我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与我们侃侃而谈的话题是杜甫和白居易。他提议明日经过黄陵时，上去拜谒一番。

那个晚上，我们听从组长的吩咐，没有迈出旅店大门一步。可是临近子夜，一群国民党宪兵却找上门来，声称奉命搜查一名可疑分子。陈绪宗当即把他们拦在门外，并大声和他们争吵起来。一会儿负责护送我们车队的副官同志闻讯赶来了，他亮出总司令的通行证，坚决拒绝宪兵的无理要求。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国民党方面来了个军官，说是误会了，请我们的副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谈谈，那群宪兵才跟着溜走了。

次日午后一时许，我们的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黄陵前。入口处有一牌坊，上书“轩辕黄帝陵”五个大字，并有卫兵守卫。那卫兵见有大群人上来，忙来拦阻，说是奉上司命令，此乃国防重地，不准参观。我们的押车副官就去找他的上司交涉。原来国民党在30年代曾将黄陵修葺一新，每年派大员来祭扫，并专门成立了个黄陵管理处，卫兵就是管理处派的。那管理处负责人见是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来谒陵，也就特别通融，亲自陪我们登上陵墓，还作了介绍。整个陵墓古朴雄伟又带点凄凉。迎面一个巨大的土冢，冢前有一平台（据传这是汉武帝所筑的祈仙台），台前立一大石碑，陵的两旁也立有若干石碑，上面刻的则是祭文。陵墓周围的山坡上是冲天的古柏，有数百株，都是千年古柏。管理处的人说，他们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防止周围的农民来偷伐古柏。至于国民党当年修葺的痕迹，已残留不多了。

我们在陵前留了影（这也是特别通融的），总司令点名要我

来讲讲黄帝的故事。我推辞不了，也就书生气十足地讲了一通黄帝的“家史”。我说，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用现代的话说，大概是中国氏族社会最早的各部落公认的首领。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先打败了炎帝，后又击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在他治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与一个叫歧伯的医生编了第一部医书《内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神话传说在人们口头传颂了五千余年，正说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讲完之后，总司令接着讲了话，他很幽默地说，刚才沈先生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总司令的话不长，却极富煽动力，我才发现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汽车经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关卡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我们稍事休息，青年们都跳下车去，兴奋地跳着、笑着、唱着，尽情倾泄他们第一次踏上自由的土地的欢乐感情。晚上我们在富县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一早，车队向延安进发。

5月26日午后，我们经过劳山，二时许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20分钟，我们到达时，总司令的车以及到七里铺来欢迎的人群已进城去了，公路旁还停着两辆小轿车，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我爬下卡车，只见德让正

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闻天，闻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闻天，七八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这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志走上前来，用上海口音问道：沈先生还记得我吧？我仔细端详，只觉得面熟，却记不起名字，就说，好象见过面。他哈哈笑道：我就是虹口分店的廖陈云。他一说，我也就认出来了。1925年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我们常见面，那时他很年轻；后来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就再未见过面，算起来已有十四年了。他们请我和仲实、德沚换乘小汽车进城。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沚也见到了琴秋。

我们被送到南门外的交际处休息，接着又被请去参加欢迎宴会。这是近百人的大宴会，菜肴虽无山珍海味，却也鲜美可口；更为突出的是宴会的气氛不同一般，大家无拘无束，笑语满堂。就在这里，我尝到了延安的名菜“三不粘”——一种用鸡蛋做的甜点。

傍晚，我们参加了延安各界在南门外操场上举行的欢迎会。这次欢迎会是临时决定举行的，因为各机关学校的群众听说朱总司令回延安来了，都自动整队来到了南门外。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又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比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来参加大会的中央负责同志都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小马扎上，我们也坐在那里。欢迎会主要是请朱总司令讲话，他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朱总司令离别延安已经两年，此次归来，又值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在山西挑起的磨擦之后，自然群情分外激昂。

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志也来了。当他穿过观众席之间的通道来到前排时，被群众发现了，大家向他鼓掌，他举手向群众致意，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又和我们一起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礼堂约能容纳六七百人，座位是固定在木桩上的长条木板；舞台却大，那天鲁艺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舞台上站了二百多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象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我到延安时，冼星海刚刚离开，没有见到他，但我从《黄河大合唱》这一组歌中认识了这位天才的音乐家。

在交际处，我和仲实各住一孔窑洞，亲身体会了窑洞的风味。早餐，我们又尝到了延安的小米粥，这是在上海难得吃到的。但儿子不喜欢吃。我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不但要习惯于喝小米粥，还要习惯于吃小米饭，因为我们将长住延安，而你们将进抗大或其他学校学习。第二天琴秋就来看望我们，她是女子大学的教育长。她建议亚男去女子大学，阿桑进毛泽东青干校。女大是新创办的学校，专门培养女青年，这对亚男很合适。让阿桑进青干校是考虑到他身体太弱，进抗大不适宜。但是儿子不愿去青干校，要去陕北公学，因为他从《西行漫记》上只知道有个“陕公”，却不知有“青干校”。琴秋解释道：青干校学生的来源比较单纯，都是象阿桑那样的学生，而陕公则庞杂。然而儿子不听，只得让他进陕公。

闻天也在第二天到交际处来看望我们。隔了一天我到杨家岭作了回拜。我们除了叙旧，还谈了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准备在延安长住下去，有机会想到前方看看。他表示欢迎。

那一天，我也拜望了毛主席，他还是那样，谈笑风生，与十

多年前没有两样。我谈了在新疆一年的经历，并把赵丹托付我帮助他们离开新疆的事，向毛主席讲了。他让我找中宣部部长罗迈（即李维汉）想想办法。于是我造访了罗迈，罗迈答应去了解一下情况。大约两周之后，他告诉我，杜重远和赵丹等人已被盛世才关押起来了。

六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到交际处看望刚到延安的陈嘉庚（国民党不让陈嘉庚率领的华侨归国慰劳团到延安慰劳，交涉结果，只允许陈嘉庚本人和他的秘书来延安）。拜会过后，毛泽东又到我住的窑洞里来问候，并送给我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交谈甚久，一起用了便饭。这一次他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问到我今后的创作活动，建议我搬到鲁艺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我说，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在这之前，有人劝我搬到全国文协延安分会去，丁玲他们都在那里，现在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去鲁艺。毛主席烟抽得很厉害，一支接一支，甚至在饭桌上也不停，饭却吃得很少。德沚劝他戒烟。他幽默地说：戒不了罗，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后来，大约在7月间，我已经搬到鲁艺，毛泽东同志又把我接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那次他和我谈的是30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

过了两天，周扬来看我，请我搬到鲁艺去。周扬在抗战初期就来到了延安，先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后到鲁艺工作。鲁艺院长是吴玉章，周扬是副院长，但实际工作由周扬抓。那时，张仲实已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工作，两个孩子也分别进了女大和陕公，我和德沚当即决定第二天就搬去。

在鲁艺我住了将近四个月，从6月上旬至9月底。我是以“客人”的身分住在那里的，既未担负工作也未任教，——这是我

事先同周扬讲好的。因为在新疆一年使我深感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仍想搞我的创作。

周扬在桥儿沟东山脚下为我准备了两孔窑洞。这里离沟口鲁艺院部约一华里，原来是个小山嘴，将它削成陡壁，正好打两孔窑洞。窑洞距地面只有两米，我们进进出出只要爬十多个台阶。两孔窑洞一孔有门，一孔只有窗户，从带门的一孔进去，有一通道与另一孔相连，我们的卧室和书房就在里面一孔，外面一孔则作客厅兼饭厅。洞壁刷了白灰，洞口向阳，窗格上虽没有玻璃而是糊的白纸，光线却很充足。窑洞前有一小块平台，可以散步，乘凉，晒被子。平台下面是翠绿的菜圃，桥儿沟著名的西红柿已开始成熟；再往前走，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周扬派来一个“小鬼”帮助我们打水、打饭。我们吃的是小灶，伙房就在附近。鲁艺对我的照顾很周到，我住在那里很安静也很舒适，有事进城，还给我派马。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作客，却不“报答”主人的款待，实在说不过去，所以，我在鲁艺的篮球场上向全院师生作了一次报告，漫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后来，鲁艺文学系希望我向同学们系统地讲点什么，我又答应讲一讲中国市民文学。因为这个内容我曾于7月初在文协延安分会指导的延安各文艺小组集会上讲过一次，那一次是从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角度讲的，题目就叫《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现在为鲁艺“客串”讲课，就打算系统地讲一讲中国市民文学的发展史。但是我从新疆出来，什么书都没有带，只凭记忆来讲，终究困难。幸而周扬为我找来了一部郑振铎在抗战前写的《中国文学史》，上面的材料相当丰富，使我省力不少。这样，我就在鲁艺文学系讲了五六次课，总题目叫《中国市民文学概论》。当时我写了详细的讲稿，可惜这份讲稿已经丢失，大概是焚于香港战争的炮火中了。现在，我自然记不得四

十年前那讲稿的内容，不过，前面提到的那篇《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大致反映了我在延安谈论中国市民文学的基本观点，所以，我想在下面略占点篇幅，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因为论述中国市民文学，是我在延安期间文学活动的一个特点。

1940年春，延安文艺界讨论得十分热闹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形式问题。年初，《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出单行本时改名《新民主主义论》），第二期上又发表了洛甫（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的文章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到延安的第三天，延安文化界曾在文化俱乐部举行座谈会，欢迎我和张仲实，我见到了吴玉章、艾思奇、丁玲、周文等老朋友。会上，大家谈得热烈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内容和民族形式、利用旧形式等问题，那时，我才知道毛泽东和张闻天写了这样两篇文章。回到交际处，我从交际处处长金城那里借来了这两期《中国文化》，把两篇文章细细读了两遍。过了几天我去拜访吴玉章（我与他1926年在广州时就熟了），他除了热情地和我大谈汉字拉丁化问题，并邀我参与发起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外，就是约我写文章参加《中国文化》上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讨论，因为他又是《中国文化》的主编。我推托不掉，就写了一篇《关于〈新水浒〉》。《新水浒》是谷斯范的一部章回体的长篇小说，他把第一部《太湖游击队》千里迢迢寄到了新疆，请我提意见，当时我正要离开新疆，就把它带到

了延安。我想，这是第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我就通过对它的评论发表自己的意见罢，这比空泛地谈理论有把握一些。

交给吴老的第二篇文章就是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讲演稿《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这是我根据记录稿重新改写的。我认为学习民族形式一要向中国民族的文学遗产去学习，二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去学习。而前者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问题。我又认为我们民族的文学遗产“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奉诏应制的歌功颂德，或者是‘代圣立言’的麻醉剂，或者是‘身在山林，心萦魏阙’的自欺欺人之谈，或者是攒眉拧眼的无病呻吟”。它们“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思想情感，全不相干”。只有剩下来的百分之一，“数量虽则太少，可是或多或少是代表了极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利益，表白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喜怒爱憎的作品”。这百分之一“才是我们民族的货真价实的文学遗产”，“这百分之一中间，才有我们的文学形式，或文学的民族形式”。我给这百分之一起了一个总名，即“市民文学”。

文章用主要的篇幅论述了市民文学的“发展史”——市民文学是在与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儒家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章说，在战国时代市民阶层已经出现了，但他们好象没有遗下什么文艺来；西汉武帝时，市民阶层的势力达到了空前的巨大，威胁着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然而那时的市民阶层也没有艺术作品留下来。是先秦以及西汉的市民阶层本来就没有艺术作品呢？还是被消灭了？我个人推想是被消灭了。因为“先秦及西汉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在哲学和政治经济（法家）方面，确已有了表现，似乎在文艺方面也不至于完全是一片沙漠”。而“儒家在汉武以后，由‘一家言’而成为‘独家言’，排斥异己（就是极力消灭凡非为封建贵族地主服务的学术思想），其专横不亚于西欧中世纪的教会”。自汉末至隋，中国处于长期纷扰中，经济严重地衰落，这虽然阻碍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却亦大大削弱了封建贵族地主阶